

金石组回顾与寄语

徐自强

笔者在国家图书馆工作期间，虽经历过较多的部门，如兼掌善本部、供职业务组（现业务处前身）、参与新馆规划办公室领导工作、筹组分馆、编写《图书府库》（即北京图书馆简史）等，但主要的业务研究部门一直是金石组。故当冀亚平组长邀我为其写点东西时，欣然从命，义不容辞。现特撰回顾与寄语数则，以备参考焉。

—

“金石”一词，早在先秦文献中已有记载，宋代已形成“金石学”，但在近百年的馆建史上，采用“金石组”这个名称或成立该机构则是近几十年才稳定下来的。

京师图书馆时（即建馆初期），一切草创，全馆只设有总务与图书两个部门，分别负责全馆行政与业务工作。民国五年（1916）冬，改设目录、度藏、总务三课^[1]，负责日常事务。民国十三年（1924）三月二十九日，又在三课下添设下级机构。如总务课下分设文书、会计、庶务三室；度藏课下分设善本、藏经、四库、普通四室管理有关藏书；目录课下设六组，以分别负责编制各类目录^[2]。民国十八年（1929）调整组织机构，国立北平图书馆下设总务、图书两部。总务部下再设度藏、阅览、编订三股^[3]。同时，于民国十四年（1925）成立的国图前身之一的《北平北海图书馆》，开办之初亦只设总务、采访、编目三科；民国十七年（1928）又增设参考科，以负责日常事务^[4]。

由上述情况可知，在馆建初期，即文津街新馆未建成、京师图书馆与北海图书馆未合并为新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前，两馆中均未采用过“金石组”的名称，亦未设立过“金石组”这一机构。现“金石组”所进行之各项工作，分别由当时有关部门承担。

民国十八年（1929），京师图书馆与北海图书馆合并，重组国立北平图书馆。同年，教育部又指令，核准《国立北平图书馆组织大纲》。文云：国立北平图书馆受教育部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合组之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之监督，搜藏图书，供众阅览。……国立北平图书馆设左列（因当时行文为从右到左竖行，故称左列，笔者注）各部，每部设主任1人，分掌馆务。一总务部、二采访部、三编目部、四阅览部、五善本部、六金石部、七舆图部、八期刊部。……金石部职掌如左：1. 关于金石拓本之采购事项；2. 关于金石拓本之整理编目事项；3. 关于金石拓本之阅览及保管事项；4. 关于金石拓本之装璜修补事项^[5]。从此以后，在国图馆建史上才有了以“金石”为名称的组织机构，并明确规定该机构应担负的任务，使图书馆金石工作的开展，进入了有章可循的新时期。这对我馆金石工作的意义是十分重要的。

1945年秋，中国人民进行的伟大抗日战争取得彻底胜利，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国立北平图书馆文津街留守部分在日伪政府统治八年后被收回，辗转迁往大后方——西南昆明、重庆等地的有关单位，陆续返里，在北平文津街七号，北图又开始了新时期的馆建工作。民国三十五年（1946），民国政府令准《国立北平图书馆组织条例》，文云：“国立北平图书馆设左列各组：采访、编目、阅览、善本、舆图、特藏、研究、总务”九组^[6]，分掌馆内各方面日常事物。金石方面工作，未再设立专门机构，有关业务纳入特藏组（即与少数民族文献资料合并在一起）进行。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国立北平图书馆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办事机构接收，从此，北图真正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同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北平定为首都，改称北京。国立北平图书馆，也随之易名为“国立北京图书馆”（简称“北图”）并继续行使国家图书馆的职能。

1949年底，北图呈文化部文物局文，即《再送本馆组织系统人事分配情形及明年度增加人事说明书》中云：现有组织系统为20个股和外地办事处3个，共为23个。其中：“金石股”，掌管金石拓本之采购、整理、编目、阅览、保管、拓印事项，管理员1人^[7]。这是建国以后北图馆建中设立“金石”机构之始。

1950年，北图呈文化部文物局文，即送《我馆组织条例》中云：“参考研究部办理参考、研究、编纂、咨询等事项，及领导馆内有独立性而又暂不能设立专部之各部门。”部下“分设参考、研究两股。苏联、舆图、金石及少数民族语文四研究室与史料征辑会、编纂委员会。”[8]这是国图馆建史上成立“金石研究室”之始。

1951年，根据文化部批准的北图暂行组织机构规定：北图设采访、编目、阅览、参考辅导、善本、特藏、保管、总务八部，26个股。负责金石工作的机构又改为“金石股”，划归特藏部领导[9]。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北图陆续将所办之分馆停办，设在外地的办事处亦撤回，集中在北京办国家图书馆。故1958年9月，又重新规划全馆组织机构系统。全馆设办公室、采访、编目、阅览、善本特藏、参考书目、科学方法研究等7个部室和一个直属的人事科。部室下原设置的“股”改为“组”，共有25个组，加上两个直属科，共为27个科组。“金石股”改称“金石组”，并重新划入善本特藏部领导。

从此以后，在北图馆史中“金石组”的名称、组织机构、隶属关系得以稳定，以至于今。其中虽于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前期，全国开展“文化大革命”，组织机构大改组，甚至曾仿“部队编制”以连、排、班制重组。但此系非常时期，早已经改正，不足为据，故文中不录。

二

采访图书，征集资料，充实馆藏是图书馆的基础工作，无此，图书馆则无存在的条件。金石组的资料采集工作，在北图的藏书建设中有悠久的历史，可谓与馆建同步，甚至更早。

譬如，还在清学部未决定筹建京师图书馆时，曾在学部任职的罗振玉先生，已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五月，就在所撰之《京师创设图书馆私议》一文中指出：“图书馆之增设与文明之进步相追逐，而中国则尚阒然无闻焉。鄙意此事应由学部倡率，先规划京师之图书馆，而推之各省会。”[10]在其所建议之办法中又指出：“四曰，征取各省志书及古今刻石也。……至古今石刻，在秦汉以前者，大有裨于古文学，秦汉以后者，亦有裨于历史。宜仿之通志馆成例，令各省进呈。其私家所藏，则如征书例可也。”可见，在京师图书馆还未决定筹组前，当时学人已有明确意见上闻，对其后的工作，肯定是有影响的。

京师图书馆筹组以后，对金石资料的征集工作，与其它图书资料一样，除共有的调拨、接受呈缴、捐赠、寄存以及征购外，还多一途径，即组织传拓。现以时间为序，简叙各时期金石资料收集入藏情况。

建馆伊始的宣统二年（1910），京师图书馆就接受了学部转来的由库伦办事处大臣拓送的唐开元御制碑《阙特勤碑》一份[11]。

民国元年（1912）“京师图书馆就以教育部的名义谕调各省官书局所刻书籍入藏该馆，”直隶、奉天等14省，均陆续将官刻书籍交该馆[12]。

民国五年（1916）四月又曾以教育部的名义，通过政事堂，取得内务部的同意，通令京内外凡经内务部立案之出版书均分送京师图书馆一份度藏。但迄未实行。1917年三月又以教育部的名义再咨内务部，请其申明前案。同年4月，内务部咨复，内务部已令京内外认真办理[13]。从此国内出版物呈缴京师图书馆一份，变成了一项不成文法。又说“金石拓片是研究古代的重要资料，1916年10月曾以教育部的名义，咨各省区征求各种著名碑碣石刻等拓本。咨文上说：‘京师图书馆为我国文艺渊府，吉金乐石，宜广收藏。乃观该馆所储碑碣拓本，寥寥无几，自非更是搜罗，恐无以发皇国华，阐扬学艺。为此咨行贵署，请烦查照，转饬所属，凡系当地著名碑碣石刻，各拓一份，迳寄本部’，转该馆度藏。”[14]后各省陆续送达者，为数颇多。

民国十八年（1929），国立北平图书馆合组前之京师图书馆所收集金石资料，并已经分类编目者，计有：

唐开成石经拓本178卷；

近代金石拓本1149种，2515张，又23册；

明代以前拓本134张，又4册；

清代帝王御书拓本257张，又4册；

墨迹等件95张，又13册5包[15]。

民国十八年（1929），国立北平图书馆合组前之北平北海图书馆建立以来所收金石资料计有：金石拓片267幅又16包[16]。

民国十八年（1929）七月，国立北平图书馆合并组建后，至民国二十三年（1934），通过多方努力，金石方面新增入藏资料有：

“1 金石拓本共1015册，3929幅。其中重要者有：王廉生旧藏碑志，端方陶斋藏拓本，新出碑志造像拓本，北平城郊各祠宇碑文全份，陈篔斋辑金文20巨册，北平孙氏陶器拓片，潍县陈氏藏瓦当拓片，泉范拓片，封泥拓片，十钟拓片，洛阳出土墓志，热河林西出土辽代碑志哀册，陕西郿县元代古蒙古诏书等。”

又“2 石刻砖瓦陶器中重要者，有汉熹平石经后记残石，郭槐墓志一方，隋唐墓志原石三方，汉熹平陶甕，汉朱书“衛”字瓦等。”[17]

同时期北图接受寄存的资料中与金石有关者还有：

1. 梁任公先生遗书，于民国十九年（1930）二月经梁氏家族会，遵照遗嘱以全部遗书遗物永久寄存本馆，共计4.2万册，其中中文书2831种，日文书433册，未刻稿本私人信札若干件，碑帖字画500多种1400多件，以及文化用具等。现金石组所存“饮冰室”专藏，即为此批遗书之一。

2. 长沙瞿兑之先生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以家藏书寄存本馆，计中文书1777种，26862册，炮式图22幅，舆图152幅，民国二十二年（1933）十月再将存书203种839册，拓片25幅，二次寄存本馆。

3. 闽侯何叙父先生于民国二十年（1931）下半年将其“绘园”所藏之秦汉瓦当422块寄存本馆，翌年上半年复将历年所得古物再次存本馆，计金石瓦当600余种，殷墟龟甲兽骨125片，铜鼓1面，匈奴饰章1面，汉唐铜镜130面，汉墓螭头基石1个，唐刻石1方，瓦当陶罐等250余件，唐末造像1座[18]。民国二十三年（1934）悉赠我馆，其中有石刻资料700余件。

民国二十一年（1932）夏，北图组织力量，传拓北京郊区石刻1700余纸，充实了北京资料。

民国二十三年（1934）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购得安徽寿州出土楚器9件，明清陶器、佛像等18件寄存本馆。[19]同年北图拨款1400元，收得金石材料多件。

民国二十七年（1938），北图昆明办事处工作计划中，于采访项目有传拓西南石刻的项目。[20]

民国三十四年（1945）抗战胜利后，北图重新在文津街开展工作，经三年多努力，又有新进展。据1949年北图统计，本馆藏书中金石资料共为23156件。其中：1 金文拓片3103份；2 石刻拓片19119份；3 甲骨877块；4 铜器15件；5 陶器29件；6 墓志造像13件[21]。

1949年3月25日，贺孔才捐赠藏书（主要为印谱等——笔者注）1408种，12768册，又书版32种，共4883册[22]。

1950年4月22日，北图呈报的藏品数量中金石方面的数量（包括未登记的）为：45199单位。其中计：1133册，38638张，342轴，4302件，34部114页，7付，629种。同时呈报的寄存数中，金石数（包括所有权不明者）为6779单位。其中计：201轴，455册，1558张，4565件。两类合计，共为51978单位[23]。

1950年一月河北霸县田伯英等将其家藏石刻资料400余件赠我馆。

1950年上海丁惠康先生将其家存之“铁琴铜剑楼”旧藏“顾氏石墨”等1100多件和《开成石经》拓片600多张赠我馆。

1950年入藏王静安先生旧藏石刻资料270余种300余件及傅沅叔先生的部分藏品。

1950年接受捐赠图书资料55份。其中翁兴庆藏拓片9份9页；北海公园拓片18份；陈宗藩拓片28份。

1950年赵万里先生从上海南京参加指导接收委员会工作后，在返京的报告中称：“总之，此次上海各书属于本馆的为208箱，……208箱中包括一部分本馆应得的交换品以及铁琴铜剑楼瞿氏的藏书13箱，朱桂辛捐赠岐阳王文物6箱。以上两种均属个别性质，须俟本馆收到文物局通知后，再行开箱，所以不应与其它书籍同样处理。瞿氏藏书，海内艳称，……这些善本书入藏本馆，本馆中文藏书地位将益形重要可为全

国之冠。朱氏捐赠的岐阳王文物十分珍贵，为考证社会历史的良好材料。朱先生保藏数十年，视同生命，亦指定捐赠本馆，不得移赠他处，郑局长及本人均十分感动，遂决接受。”[25]

1951年1月北京文物组赠辽宁石刻一套，20余种。

1951年5月文化部文物局拨交天津缪继珊“铁如意斋”藏品，其中石刻资料达到1100多种3000余件，汉魏石经残石360块。

1951年江苏常熟翁同龢后人，赠石刻资料40多种。

1953年前后，江苏常州章钰“四当斋”所藏石刻资料1381种1713件入藏我馆。近年，今人周绍良先生出让的章氏藏拓又达498种518件。为此，我组藏章氏收藏的石刻资料共为1879种，2231件。

1955年4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通知（55）文秘字第138号为颁发“文化部关于征集图书、杂志样本办法。”[26]国立北京图书馆再次被确定为国家样书呈缴单位。

1955年，北图工作总结称：在图书补充方面，舆图、手稿、拓片、胶片合计，共24658张[27]。

1956至1958年，北图金石组与中国佛教协会一道传拓入藏北京房山石经拓片30000多张。

1958年前，刘体智“善斋”藏甲骨2万多片拨赠我馆；陆和九藏拓片入藏我馆。

1958年北图藏品中，金石资料（不包括书版、经版）共161168单位。其中：

1 拓片类，已整理的为57111张，6279册，339轴，未整理的3896种，另中采组存6000份，共计127625份。

2 实物类，甲骨33180块，石经363块，书版5450块，经版79063块，共计118029块[28]。

1963年完成石刻拓片的收集和甲骨文的传拓，计4439张[29]。

1965年初，在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下，以重金从香港购回拓本一批。其中唐末或北宋拓《神策军碑》一册，为金石组镇库之宝；宋元拓《蜀石经》七册，为国内现存最佳拓本。

1966年至1976年，全国进行“文化大革命”，图书馆业务工作基本停顿，至七十年代，部分工作得以进行如：

1972年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国学大师陈垣教授逝世，将其藏书4万多册捐赠国家转我馆，其中有部分金石资料。

1977年苏州叶诚祐先生，将其先人叶昌炽“五百经幢馆”部分藏品300多种，1000余件捐赠我馆。

1977年王敏同志将所藏南宋拓《麓山寺碑》捐赠我馆。

70年代，金石组曾奔赴河北承德，西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地传拓石刻资料400多种1000余张[30]。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进入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振兴中华的新时期，图书馆工作也重新活跃起来。尤其到了廿世纪八、九十年代，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高潮。至廿世纪结束，北图金石组所藏金石资料，总计共133643种，266751件。其中：

1. 甲骨35651片，甲骨拓片22324种，83602张；

2. 铜陶砖瓦2002种，2655件；

3. 各地拓片与拓本：

各地石刻：19461种，31584件；

北京石刻：6494种，15376件；

房山石经：30244张；

墓志：7307种，13038件；

画像：2104种，4258件；

造像：6559种，7597件；

裱本：3000种，5602件；

裱轴：1595种，1878件；

法帖：874种，4105册；

- 专 藏：4661种，4105册；
善 拓：703种，2600件；
4. 玺 印：602种，2841件；
5. 画 册：308种，644册；
6. 墨 迹：195种，433件；
7. 照 片：1997种，5570件；
8. 书 籍：1958种，9839件。

三

金石资料的阅览、参考咨询、提供服务的工作，多在馆部阅览室中一并统计，故金石方面单独的资料阙如。

金石资料的整理、研究、出版以及调拨交流等，基本上与金石资料的征集与入藏是同步的，而且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下面就这方面的工作，以时代为序，略述简况。

民国十六年（1921），据教育部令，京师图书馆与历史博物馆藏品中，均有两馆可互为补充之材料，故“经两馆派员汇同清理，计书871种由图书馆检去；唐人写经、各种碑碣及鹿皮，签发移送历史博物馆，计62种。”^[31]这是我馆与友馆首次开展这方面的交换与调拨工作。

民国二十三年（1934），编辑出版石刻等方面的拓本11种^[32]。

民国二十五年（1936），我馆杨殿珣编著《石经论著目录》一种^[33]。

民国三十年（1941），我馆杨殿珣等编著《石刻题跋索引》一种^[34]，分7类，收书138种，列条目18370条，子目4万多条。同年，又编辑出版《国立北平图书馆馆藏碑目（墓志类）》一种，收馆藏墓志1400多种^[35]。

民国三十一年（1942），编辑《西南碑志目》一种，《滇南碑传集》一种，纳入《西南文献丛刊》乙种出版^[36]。

民国三十五年（1946），编辑《甲骨文论著目》一种，收书籍论文350余种^[37]。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图书馆得到大发展，资料与人员均大增，整理、研究、交换等工作也步入新时期。这个时期有关撰著数量，除每个人都有数目不等（从数篇至数十篇）的论文发表外（限于篇幅不录），专著与目录等也有相当的进展。简记于后。

1950年，曾毅公编《甲骨缀合编》一种二册，缀合编撰甲骨396片^[38]。

从1951年收集的金石资料中，整理编目入藏1122种^[39]。

1954年初，曾毅公等编《殷墟文字缀合》一种，缀合甲骨482片^[40]。

1955年，整理编目入藏金石拓本资料25115种，42647件^[41]。

1956年，整理编目入藏金石拓本资料3312种，3347张^[42]。

1958年，整理清查金石资料57111张，6279册，339轴^[43]。其中经过加工者16323种，16323份^[44]。

1959年，为支援中国历史博物馆新馆建设，北图调拨金石资料130件。其中有《汉熹平石经后记》残石一方，甲骨129片^[45]。

1963年，分类编目石刻资料1566种，1566份^[46]。同年向北海公园管理处调拨《三希堂法帖》2部，共990张，支援该园建设^[47]。

1965年，整理分编石刻拓片资料4106种^[48]。

1965年，以前的五、六十年代，金石组还编辑《北京图书馆藏北京地区石刻目录》和《房山石经题记汇编》初稿各1种。

1966夏，进入“文革”时期，业务工作基本停止。

1978年，中国进入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振兴中华的新时期。金石组重新活跃起来，尤其是关于金石资料的整理、研究、编辑工作在二十世纪后期的八、九十年代，有了突出的进展，获得了较

丰硕的成果。下以专著为例（论文不录）简述如次。

1979年，金石组编《龙门四品》1种[49]。

1981，王巽文、徐自强、冀亚平编《法源寺贞石录》1种，收录该寺石刻39种[50]。

1985年，徐自强等编《北京图书馆藏青铜器铭文拓本选编》1种，从馆藏1262种拓片中选编有特点的铜器拓片359种，介绍出版[51]。

1987年，曾毅公编《石刻考工录》1种，摘引自碑刻900余种中，收刻工1800多人[52]。

1987年，金石组全体同仁将五、六十年代编《房山石经题记汇编》初稿，重新校对整理出版，收各类题记6800多则[53]。

1987年，徐自强主编、王巽文、冀亚平、张聪贵、王丽燕、杜伟生、赵海明编辑《北京图书馆藏石刻叙录》1种，收集介绍馆藏历代重要拓本约300种[54]。后获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十周年二次文献成果奖。

1987年，徐自强、张聪贵编《齐白石手批师生印集》1种18册（线装一函），收印和批语700余件[55]，其后，书目文献出版社又改编成普及本梓行。

1988年，徐自强等编《北京图书馆藏甲骨文书籍提要》1种，介绍评述有关著作237种[56]。

1988年，徐自强等编《北京图书馆藏周希丁手拓铜器铭文选编》1种，从北图藏周拓的750种拓片中，选编460余种（其中全形拓170多种）[57]。

1989年，徐自强主编，王巽文、冀亚平副主编，王丽燕、李森、汤更生、赵海明、安都、贾双喜、袁玉红编辑《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1种101册，收石刻拓本近15600种。至1991年出齐[58]。在1989年仅出版35册的情况下获河南省“优秀图书”一等奖。

1990年，王敏辑编《北京图书馆藏善拓题跋辑录》1种，收题跋83种数百则[59]。

1990年，徐自强、王巽文、冀亚平编《北京图书馆藏墓志拓片目录》，收馆藏墓志4600多种[60]。后获“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十周年二次文献成果奖”。

1991年，徐自强等编著《中国的石刻与石窟》1种[61]。该书作为《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之一，1992年获中国图书评论会“第六届图书一等奖”，1993年获“希望杯奖”与“畅销书奖”。

1993年，冀亚平主编，贾双喜、王丽燕、袁玉红、李森、汤更生、赵海明编《北京图书馆藏画像拓本汇编》1种10册，收各类画像2100多幅[62]。

1994年，徐自强，冀亚平、王巽文编《北京图书馆藏北京地区石刻拓本目录》1种，收北京石刻6340种[63]。

1995年，冀亚平，贾双喜、王丽燕、汤更生、李森编《梁启超题跋墨迹书法集》1种，收题跋120余种[64]。

1996年，金石组编，吴元真跋《松雪斋乐善堂帖》1种2册[65]。

1997年，贾双喜编撰前言，《北京图书馆藏青铜器全形拓本集》1种4册。收青铜器全形拓片709种[66]。

1999年，金石组编，吴元真跋《赵松雪书太上玄元道德经》1种[67]。

1999年，徐自强等编著《古代石刻通论》1种5篇70万言[68]。

2000年，吴元真主编，冀亚平、贾双喜、王丽燕、袁玉红、史百艳编《北京图书馆藏龙门石窟造像题记拓本全编》1种10册，收龙门石窟造像题记2000多种[69]。获2001年度第三届全国图书古籍整理图书奖一等奖，并荣获第五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2001年，金石组编，吴元真撰说明《柳公权神策军纪圣德碑》1种[70]。

2001年，吴元真序，冀亚平、贾双喜、王丽燕、袁玉红、史百艳编《乾隆钦定传世法帖》1种7册[71]。

四

图书馆工作人员的聘用和数量的增减是与有关机构的设置和业务工作的开展基本上是同步的。在这个过程中，同时也是人才的成长和提高自己的过程。

京师图书馆和北海图书馆时期，事业初创，机构简单，人员较少，主要为通用之才，所谓一人兼多职者也。概言之，只能从行政与业务两个方面去区分。这时期，既无金石方面的专门机构，故也无相关的业务人员。

1929年，京师图书馆与北海图书馆合并，新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建立，尤其是文津街新馆舍落成后，有了较大的变化。1931年后，北图有了八部的机构体系，金石工作，第一次有了专门机构，而且成为八部之一。故其专业人员也开始陆续到位。

首先到北图并做金石工作的是范腾端。范氏字九峰，1920年冬先在京师图书馆供职，后至武昌图书馆专科学校深造。1929年新国立北平图书馆成立后，调至金石部工作。1933年曾被北图派往南开大学，协助该校整理中文旧籍，1934年回馆，仍到金石部工作[72]。

其次到职的是刘节先生。刘节，浙江永嘉人。1901年生，父刘景晨是浙江温州知名的“傲骨学者”。1926年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第二届学生。1928年研究院毕业后，被天津南开大学聘为讲师[73]。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到国立北平图书馆供职。1931年6月，北图任刘为馆编纂委员会委员[74]，1934年6月又任其为金石部代理主任[75]。这是北图的第一位金石部主任。后来他先后到河南大学，燕江大学、浙江大学、金陵大学任教，最后归宿于中山大学。刘先生一生从事先秦古史、先秦诸子、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深受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等大师的影响，品行耿直，视德为做人与学术之本，提倡“考据学是求真之学，只要我们真的是求真，是可以殊途而同归的”[76]，可见，刘先生是一位朴素的唯物主义者。他在我馆工作期间，写过一些很有分量的关于金石方面的文章，如《中国金石学绪言》，《汉熹平石经·周易残字考》等即其一例[77]。

第三位到北图金石部任职的为谢国祯先生。谢先生字刚主。到北图供职后，1931年春，曾被馆派往日本留学二年。这个期间他曾为本馆调查及采访日文书籍，期满后仍回本馆服务。1935年10月，任代理金石部主任。发表有译著《明奴儿干永宁寺碑考》（日本内藤马次郎著）。建国后在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工作，直至逝世，为著名明史专家。

民国三十六年（1947）曾毅公（1903—1991）先生到馆。曾先生，满族，曾在山东大学供职，甲骨学家，尤长甲骨缀合，出版有多种专著。在北图时，一直负责金石组的工作，任研究员。后退休。

建国后，金石组工作人员续有增减，简况如次：

于秀卿，1954年3月到馆，后到金石组，主从事甲骨方面的整理工作，直至离休。

王巽文（1930—1991），1954年9月到馆，到金石组后，主要从事石刻拓片的整理编目工作，后退休。

王敏（1916—1995），1956年10月到金石组工作，石刻拓本鉴定专家，曾于文革期间在外地战备库工作数年，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后退休。

张广泉（1915—1991），1958年7月到金石组工作，主要从事甲骨的传拓工作，高级技师，后退休。

徐自强，1965年7月，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研究生毕业后分至金石组工作。曾任组长，研究馆员，后调离去筹组分馆，任常务副馆长，现退休。

贾双喜，1974年到金石组，主要从事甲骨传拓整理工作，曾任金石组副组长。

冀亚平，1975年到金石组，主要从事石刻资料的采集，传拓整理编目工作，现任金石组组长。

张聪贵（1943—1987），1964年到馆学习，后到金石组，主要从事玺印的收集整理工作。

王连祥，1979年到金石组，主要从事书库管理和阅览工作，已离组。

王丽燕，1981年到金石组，主要从事石刻资料的整理编目工作。

张松珍1983年到金石组，主要从事库房管理与阅览工作，已退休。

赵海明，1984年到金石组，主要从事石刻资料、玺印等整理编目工作，已离组。

袁玉红，1986年到金石组，主要从事甲骨的传拓与整理工作。

安都，1986年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分至金石组，主要从事石刻资料的整理编目工作。

李森，1986年北大中文系毕业后分至金石组，主要从事石刻资料的整理编目工作，已离馆。

汤更生，1988年北大中文系毕业后分至金石组，主要从事石刻资料的整理编目工作。已离组。

吴元真，1989年到馆，北京师范学院（今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毕业，曾任分馆线装组组长，1995年调金石组，现任金石组副研究馆员。

史百艳，1996年吉大考古系研究生毕业后分至金石组，主要从事古文字金石资料的整理编目工作。

史睿，1997年首师大历史系毕业后分到北图工作，2003年调金石组，现任金石组副组长。

五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感慨良多。

（一）金石组（或部、股、室）的成立，虽仅有70多年的历史，但它现在所保存的资料，却是几代北图人近百年工作的成果；如从其资料流传的渊源分析，更是千百年来历代金石家（或收藏家）或有关组织，辛勤收集与呵护的结果。其所经历的散佚，存亡，更令人扼腕！

它现在入藏的数量，虽只有20多万件，但类别齐全，特点突出，在全国相关资料的收藏者中也是主要的收藏单位之一。其资料的时代，从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1000多年来的拓本至近代的各类资料，也可谓是洋洋大观，叹为观止。因此，我辈学子有机会亲自参与保藏与整理研究，感到十分的荣幸与光荣，但同时也责任重大。如何在我辈手中，将其完整地传之永久，让后人也能感受这无限的荣光，却是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二）我国对金石资料的整理研究工作，虽已有千多年的历史，梓行的著作也在千部以上，但由于其所存数量巨大，分布地域辽阔，内容丰富，门类多样，加之专业人才缺乏，很多材料还未被涉及，已被涉及者，也还需要深入。尤其是在各地区保存的石刻与石刻资料，这些最具原始价值的财产，多未能有很好的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仍是未开垦的处女地。今之学人，如何在前人的基础上，兢兢业业，孜孜以求，不断提高自己，不断扩大队伍，将这份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发扬光大，以不负前人的嘱托，今人的期望，国家民族的要求，望多思之，念之，以传久远。

（三）石刻资料是世界人类文化遗产中门类之一，但就其表现形式，则各有特色。大多数的文明古国及欧美非洲地区，多以石刻艺术品的形式（如石雕、石窟、石建筑等）闻名于世，中国除以石刻艺术品见长以外，还有极为丰富的石刻文字作品，为世界所独步。这一特色与各国相比较，更显突出，它门类齐全，内容丰富、数量巨大、时代绵远、为各国所不及。尤其是将各家、各派成部成套经典镌之于石，如儒家之“十三经”，佛教之“大藏经”、道教之“道德经”等，更为世界之最。

面对世界文化遗产，人类文明的奇葩，我们骄傲！我们自豪！

面对先人的辛勤，伟大的功业，我们赞叹，我们沉思！

“国魂”，“族魂”所系的瑰宝啊！如何在“地球村”内交流，发扬，深感任重而道远！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注释：

[1] 民国五年十二月三十日（1916.12.30）教育部指令批准《京师图书馆暂行办事规则》第三条。载北京图书馆业务研究委员会编《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下简称《汇编》）下958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出版。

[2] 民国十三年三月二十九日（1924.3.29）教育部指令，核准《京师图书馆暂行办事细则》，载《汇编》下1007—1020页。

[3] 民国十八年五月二十一日（1929.5.21）教育部令，核准《国立北平图书馆组织大纲》，载《汇编》下1040—1041页。

[4] 民国二十三年一月二十八日（1934.1.1）《国立北平图书馆概况》，载《汇编》下1234—1251页。

[5] 民国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929.11.28），教育部指令，核准《国立北平图书馆组织大纲》，载《汇编》下1054—1061页。

[6] 民国三十五年六月二十八日（1946.6.28），国民政府令准《国立北平图书馆组织条例》，载《汇编》下1083页。

[7] 1949年12月16日呈文化部文物局人字第712号，再送本馆组织系统人事分配情形及明年度增加人事说明书请转核。载《汇编》（二）上83—106页。

[8] 1950年5月23日呈文化部文物局民字第568号，呈送我馆组织条例，请鉴核。载《汇编》（二）、上、117—123页。

[9] 1951年11月8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局通知抗字2504号你馆暂行组织机构及股以上人事配备已呈部批准，自本月起试行由。

- 载《汇编》(二)上167—168页。
- [10] 罗振玉撰《京师创设图书馆私议》，载《汇编》下1123—1125页。
- [11] 载《汇编》上，12页。
- [12] 李希泌著《鲁迅与图书馆》，载《北图通讯》1979年1期。
- [13]、[14] 均见注(12)
- [15] 1930年10月国立北平图书馆第一馆概略。载《汇编》下1149—1173页。
- [16] 1930年10月国立北平图书馆第二馆概略。载《汇编》下1174—1199页。
- [17] 1934年1月国立北平图书馆概况。载《汇编》下1234—1251页。
- [18] 见注[17]。此项寄存物品，后经多次交涉方成为馆藏。见1931—1937年北平图书馆委员会会议记录。
- [19] 1931年6月至1937年3月29日，图书馆委员会第1至第25次会议记录。载《汇编》上334—355页。
- [20] 1938年国立北平图书馆昆明办事处大纲。载《汇编》下1078页。
- [21] 1949年北图馆藏统计。载《汇编》下1105—1119页。
- [22] 1949年7月31日北平图书馆接管大事表。载《汇编》(二)下867页。
- [23] 1950年4月22日呈文化部文物局民字第463号呈报清点工作附呈各项统计表。载《汇编》(二)上458—475页。
- [24] 北京图书馆1950年工作总结。载《汇编》(二)上604—611页。
- [25] 1950年1月赵万里先生报告参加国务院接收委员会华东工作团的工作情况。载《汇编》(二)上446—449页。
- [26] 见《汇编》(二)上235页。
- [27] 见《汇编》(二)上657—668页。
- [28] 1958年8月北京图书馆入藏书籍说明。载《汇编》(二)上250—253页。
- [29] 北图1963年工作总结。载《汇编》(二)上761—796页。
- [30] 徐自强、冀亚平《北京图书馆金石拓片的收藏整理与研究》，载《北京图书馆馆刊》1998年1期。
- [31] 1921年6月9日教育部令，载《汇编》上99—100页。
- [32] 1934年1月国立北平图书馆概况。载《汇编》下1234—1251页。
- [33] 杨殿珣《石经论著目录》北平图书馆1936年出版。
- [34] 商务印书馆1941年出版，1957年重印第一版增订本。
- [35] 北平图书馆，1941年出版。
- [36] 1942年11月30日国立北平图书馆昆明办事处报表。载《汇编》下1266—1275页。
- [37] 1946年12月国立北平图书馆复员以来工作概况。载《汇编》下1266—1275页。
- [38] 线装2册，修文堂书库，1950年出版。
- [39] 1951年北图工作总结。载《汇编》(二)上612页。
- [40] 科学出版社，1954年出版。
- [41] 1955年北图工作总结。载《汇编》(二)上657—668页。
- [42] 1956年北图工作总结。载《汇编》(二)上669—685页。
- [43] 1958年8月北图入藏书籍说明。载《汇编》(二)上250—253页。
- [44] 1958年北图工作总结。载《汇编》(二)上686—694页。
- [45] 1958—1963年，对外调拨图书期刊数字统计表。载《汇编》(二)下1735—1741页。
- [46] 1963年北图工作总结。载《汇编》(二)上761—796页。
- [47] 同注[45]。
- [48] 1965年北图工作总结。载《汇编》(二)上816—836页。
- [49] 文物出版社，1979年出版。
- [50] 载《法源寺》一书中，中国佛教协会1981年出版。
- [51] 文物出版社，1985年出版。
- [52] 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出版。
- [53] 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出版。
- [54] 在《文献》杂志多期连载的基础上，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出版。
- [55] 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出版。
- [56] 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出版。
- [57] 中华书局正在出版中。
- [58] 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1991出版。
- [59] 文物出版社，1990年出版。
- [60] 中华书局，1990出版。
- [61] 商务印书馆，1991年出版，1996年增订版。
- [62] 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出版。
- [63] 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出版。
- [64] 荣宝斋出版社，1995年出版。
- [65] 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出版。
- [66]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出版。
- [67]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出版。
- [68] 故宫紫禁城出版社正在出版。
- [69]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
- [70]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出版。
- [71] 昆仑出版社，2001年出版。
- [72] 1931年6月6日至1937年3月29日，图书馆委员会第1次至第25次会议记录。载《汇编》上334—335页。
- [73] 陆健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223—224页。三联书店，1995年第1版。
- [74] 同注[73]。
- [75] 同注[73]。
- [76] 同注[74]224—228页。
- [77] 载《图书季刊》1934年第一卷第二期。